

1932 — 1942

使日十年

[美] 约瑟夫·C·格鲁 著



商务印书馆

使 日 十 年

——1932至1942年美国驻日大使
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

〔美〕约瑟夫·C·格鲁 著

蒋相泽 译

陈宏志 李健辉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3年·北京

TEN YEARS IN JAPAN
A Contemporary Record Drawn from the
Diaries and Private and Official Papers of
JOSEPH C. GREW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Japan, 1932—1942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Third Printing, 1944
根据美国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44年第三次印刷)版本译出

SHǐ Rì SHÍNIÁN
使 日 十 年
——1932 至 1942 年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
〔美〕约瑟夫·C·格鲁 著
蒋相泽 译
陈宏志 李健辉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601

1983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427 千
印数 7,300 册 印张 18
定价: 2.20 元

译者前言

约瑟夫·克拉克·格鲁是美国职业外交家。1880年生于波士顿。190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得学士学位。两年后即开始担任外交职务。1924年升至副国务卿，主持建立美国的外交人事制度。1927年出使土耳其。1932年调任驻日大使，直到1941年12月日美交战为止。1942年春，日美双方达成交换外交人员的协议，格鲁被遣送回国。1944年，再任副国务卿。1945年8月盟国敦促日本投降时，格鲁力主保持日本的天皇制，以便美国能在战后通过这个制度控制和利用日本。同年退休，1965年去世。

从20世纪初叶的日俄战争后，日本即成了美国在远东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反对日本独霸东亚，力图加以抑制。但另一方面，美国又想利用日本对抗沙俄，保持远东均势；同时还想把中国东北变成一个“安全阀”，将日本向太平洋和美国东海岸扩张的锋芒引向东亚大陆。因此，自1905年起，美国的对日政策即兼有抑制的一面和纵容的一面；斗争的方法亦有进攻的一手和退让的一手，两手交替使用。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严重危及美英法在中国的殖民利益。但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威胁下，美英法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迁就退让，希望苟安于一时，并企图把日本这股祸水引向当时的苏联。

以沉着、圆滑、老练著称的格鲁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调到日本来的。《使日十年》一书，就是他在出使日本期间所记日记的选辑，也可以说是他对这段历程的纪略。

在开头的几篇日记里，格鲁就公然宣称，他“非常同情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愿望”，只是不赞成日本使用武力；认为东亚的现状可以改变，但应当用“合法”、渐进的方式来改变。这和后来英国首相张伯伦对纳粹德国讲的话很相似。无怪乎格鲁直言不讳，说他对日本也是实行绥靖，尽管他对“绥靖”一词作了一番辩解。可是，美国越迁就，日本越进逼。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格鲁也不得不埋怨日本要把美国利益全部排除出中国了。

格鲁曾寄望于鼓励和支持日本的稳健派（即主张用略微温和渐进的手段进行侵略的一派），使其有朝一日取代极端派；同时又不不要刺激极端派，不要给日本国内造成紧张局势，从而使军阀得以牢牢掌权。但是，稳健派软弱无力，军阀嚣张如故，美日矛盾亦趋于尖锐。到了1939—1940年，日本加速执行南进政策，竭力排除美英在远东的势力，并正式加入轴心国集团时，格鲁才比较清醒起来，他终于认识到“绥靖政策是一条死路”，“我们迟早会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

《使日十年》一书反映了美日矛盾日益激化的过程，反映美国绥靖政策走向破产的过程。书中格鲁的日记是逐日记下发生的事件和自己的感想，许多细节是在正式文件中看不到的；日记之外，还转录了若干篇有关的公私文件，合成一册。此书对于我们研究30年代日美外交史、远东国际关系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可以提供一些颇有价值的资料。

书中有几篇日记，如照录日本交通规则、日本人写的不通的英文书信等等，参考价值不大，有些不必译，有些不可能译，故略去未予刊用。

译文难免有错误，请读者指正。

目 录

序 言.....	1
一、暗杀者的阴影笼罩着日本.....	5
(1932年5月14日—1933年2月15日)	
二、暴风雨前的三年平静.....	79
(1933年2月20日—1936年2月11日)	
三、从未遂政变到公开战争.....	175
(1936年2月26日—1937年7月13日)	
四、中国事变.....	213
(1937年7月8日—1939年10月10日)	
五、一个世界:两场战争	287
(1939年10月10日—1941年12月8日)	
六、一个世界:一场战争	487
(1941年12月8日—1942年5月31日)	
日本主要官员及各国派驻日本的主要外交使节人名一览表...	536
索 引.....	557

序 言

本书有其写法和目的，这两点都需要解释一下。

先说写法。我确信，要准确地记载历史，必须依靠当时的直率的评述，所以我在美国外交界服务的三十九年中，都保持一个习惯，即把当时的情报、印象和想法逐日摘记下来。这样作成的记录，优点中有缺点，缺点中也有优点。我们的决定和行动所依据的信念和设想，只有在诚实坦率的日记中才能找到它们的记录。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企求绝对正确，但是人人都可以随时把他的真实意见记下来。这些意见当然会改变，有些是因为情况变了，有些则是因为我们不断获得新的材料，使我们修改了原来的看法。

我在日本十年间记的日记，带有这类记录所共有的缺点，但是，如果说我作的判断因情况改变而常有修改的话，前后的实情也还是认真地逐日记录在案的。此外，我还认为，这种严格按照当时实情记下来的东西，自有其价值，同所记的判断明智与否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有些意见，虽然后来因为我注意到新的事实而有所修改，也还是照录在这本书中。有些观点和预言，后来证明是错了，也仍然载入本书，直录不讳，和经时间证明为正确者一样。保存日记时，决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要发表。而且，特别是在驻日使馆这样的岗位上，在珍珠港事件前的那些艰难岁月里，我们不可能象在华盛顿那样纵览全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不可能和在华盛顿形成的观点完全一样。观点产生于一个人的知识，更多的知识又扩大和加深一个人的认识，使其理解力更加敏锐。

我受过许多挫折，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些时期：我与关怀和平、

有心做建设性工作的日本政府合作刚刚取得一点成就，即因政府倒台，换成反动内阁，希望又全部落空，就象遇到台风一样，瞬息之间成果一扫而光，尽管如此，我还是为和平奋斗到底。一个大使，刚到外国就职，即攘臂大呼“战争不可避免”，那就等于卷起铺盖回老家。我们的外交，是我们国防的第一线。只要可能，就必须守住这一线；要守住，就得做工作。就日本的情况来说，欧战一爆发，德国的初期胜利就象烈酒进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头脑一样，局势即露出了不祥之兆，当时我就向我国政府预报，日本可能会采取行动，还可能会是危险的、戏剧性的突如其来的行动。但是，我决没有完全放弃和平的希望，也没有停止为和平做工作。不那样做，就会损害我国外交的名声，而我则是外交界的一个成员。

这里还应记住一点。本书所收录的，不过是原来日记的一鳞半爪。过去十年的日记有打字机打的十三巨册之多，此外，我的书信、讲稿、会谈记录、有关剪报，也有若干册。原来的日记中有很多条并没有什么永久性的历史价值，重复的也不少。有许多则不适宜于现在发表。而且，因为日记是私人的、不供发表的记录，所以我还得为许多在世的同僚及其他人物的身分保密；假如透露他们的姓名，就可能会使他们为难，或给他们个人带来不利的后果。不过，这些删节并不损害主要情节。为了避免搅乱正文，我没有用星号和脚注，只是把日记原稿的一些条目和同时期的其他材料选编在一起，使之成为流畅的编年体记叙文。要把所有与情节有关的官方文件全文纳入日记，显然是办不到的，但这些文件有许多已经发表了，美国政府印刷局在1943年出版了两卷文件集，题名《美国对外关系，日本部分，1931—1941年》，大家都可看到。

再谈一下此书的目的。此书目的在于向我国人民——希望还有加入联合国的各国人民——提供一个比目前一般见解较为准确的关于日本问题的看法，因为，只有对日本和日本国民有一个正确

的概念，才能明智地处理一些困难问题，我们在军事上获得全胜以后，这些问题是一定得解决的。我上次写《东京报告》一书，其主要目的是要使美国人民了解日本军事机器的不可轻视，纠正一些谬误的想法，这些谬误的想法曾泛滥全国，总是低估日本这个敌人的生命力、战斗力和持久力。经过长达十年的仔细观察，我了解敌人，因此我担心，我们可能要走一段漫长而艰苦的路程，才能获得全胜。打如意算盘，有自满情绪，都是危险的。要获得全胜，要使敌人最后无条件投降，必须不断加强、加快我们的举国一致的战争准备工作，决不可有片刻懈怠。

日本军阀和军事机器的极端阴险、狡诈、残忍的行为和自私的背信弃义，几年来我们已经积有许多证据，我的叙述又提供了新的证据，证明日本军人的心理和气质实具有中世纪的特性。兵家有句基本的格言，叫做“了解敌情”。我的前一本书，我在全国各地发表的演说和广播，都是想陈述日本军人强大的实力和疯狂的决心，极端的残酷和野蛮。

现在有许多日本人并不想要战争，他们已认识到进攻美、英和联合国其他国家是愚蠢的，他们曾经尽力阻止军部极端分子进行鲁莽的、自取灭亡的侵略，假如现在这本书不能使读者清楚地看到这个事实，此书还是有一个目的没有达到。由于战时的愤激情绪和偏见，有些人将会否认日本国民中也有好人。可是这些苛求于人的，十之八九对日本人都没有亲身的、直接的了解，他们不知道，有些日本人曾坚决反对同美国打仗，这些人逆流而进，力图挡住军人的自大狂和扩张野心的浪潮，为此他们曾勇敢地却又无效地豁出一切，甘冒被监禁甚至被暗杀的严重危险——事实上也确实有几个人被刺杀了。

在战争中，日本人必须而且必定会忠实拥护他们的首领，必须参加战斗的人也定会战斗到底。但是，在处理战后的困难问题时，

我们必须了解和权衡一切因素。我的希望是，这些私人的逐日记录，也许能为将来提供一幅较广阔、较有用的图景，以便了解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的情况。

不过，首先还是要全部摧毁日本的作战力量；要使我们的子孙在下一代不致再打这种仗，就必须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决不能让日本和德国再来威胁世界和平。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必须永远根除。

在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我不能不向三位人士表示感谢，这书是在他们的帮助下编写的：一个是尤金·H·杜曼，珍珠港事件前最关键的那几年，他任美国驻日大使馆参事，他是我的挚友，有久居日本的经验、成熟的意见，和对政治情势的敏锐的判断力，书中陈述的那几年的许多观点，都是靠他的帮助酿成的；另外是我的两个秘书，马里恩·阿诺德小姐（现在是达纳·W·约翰斯顿夫人）和纳尔逊·牛顿，为帮助我撰写本书所依据的日记，他们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对此事关怀备至。

约瑟夫·C·格鲁

华盛顿

1944年1月

一、暗杀者的阴影笼罩着日本

1

(1932年5月14日—1933年2月15日)

本书所记之事,历时十年,在此期间,日本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发生过一系列爆炸性的危机。这些危机,有的仍未超出政治范围。有的则采取暗杀和军事进攻的形式。1932年这一年就是以一连串政治暗杀事件开始的,5月15日犬养首相被刺,是这类事件的高潮。因此本书头一部分叙述的是一段表面平静的时期。只有这一回不是以暴力事件,而只是以日本承认满洲国和决定退出国际联盟而告一段落。

使 日 之 始

1932年5月14日—18日。在芝加哥至旧金山横贯大陆的高级快车上

我们出发了。此番是去承担我们的第十四个差事，第四次出使。在我们这千变万化的生活中，这将是一场新的冒险行动，也许还会是最冒险的一次。五年以来，我们看到土耳其共和国从覆灭了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中破土而出，披荆斩棘，艰难行进，获得了新生。现在我们又进入一个大得多的舞台，在未来若干年也许是几十年中，全世界的注意力将会集中在这里。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只有一件除外，那就是：日本放弃它在满洲的投资、财产、侨民和重大利益。它是一定要呆在那里的，除非一仗失败。现在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它将采取什么政策和方法以对付国际上的敏感，用什么伪装来掩盖这些不愉快的事实。

确实有许多有趣的问题已经出现了。日本将满足于保住它在满洲的现有利益呢，还是象某些人说的那样，它的计划有囊括亚洲、建立庞大帝国之意，而以征服朝鲜为第一步，征服满洲为第二步？它能避免得了与苏俄和美国的冲突吗？最大的问题是，日本这样一意孤行，会不会终将碰到世界反对势力的坚定不移的抵抗；如果碰到抵抗，由此引起的冲突又将采取什么形式，是国内的革命，还是与外国的战争。那主要将取决于日本采取什么手段，而这也就是我们即将受权从它内部去观察的问题，我希望在今后能作长期的观察。

我要尽量保持不偏不倚的观点。一个大使，一开始就对驻在国抱着偏见，那就等于卷起铺盖回老家，因为他的偏见迟早总会让

人发觉,使互相信任的基础无从建立,而他又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完成有裨益的工作。另一方面,又总有过多地受到当地气氛的感染的危险。不过,我深知总统、国务卿和国务院的心意,这将有助于保持正确的航向。首先,我非常同情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愿望,但对它为实现这些愿望而采用的非法手段却毫不同情。

4

趁世界各国忙于世界大战之际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自1931年9月18日以来不顾《凯洛格非战公约》^①、《九国公约》^②、和《国际联盟盟约》^③而在满洲和上海采取典型的普鲁士手法^④,诸如此类,都是很难令人同情的。纯属中日之间的问题,情形特别复杂——如条约怎样解释,哪些条约是有效的,谁先违反有效的条约等——以至人们只好把这方面的情况视为技术上不能解决的难题。幸亏我们的立场是极其鲜明的:对中日之争,我们不袒护任何一方;我们维护的是国际和平条约和“门户开放”原则的不可侵犯性,而且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和我们所采取的立场都已经向全世界仔细表述过了,今后有必要时还要继续这样做。这里就讲这么多,作为后文的前言。

我赴任伊始,即闻局势鼎沸。《先驱—调查者报》有位记者在芝加哥车站迎接我们,送来该报5月16日的星期日晚刊,上有非

① 《凯洛格非战公约》,订于1928年8月,有四十八个国家参加。因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起而得名。《公约》只规定国与国之间须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不诉诸战争,但如何实现这一要旨,却没有规定。——译者

② 《九国公约》,订于1922年2月,参加者为美、英、法、日、比、意、葡、荷、中九国。《公约》责成缔约国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遵守“门户开放”原则和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实际上是把中国置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支配之下。——译者

③ 《国际联盟盟约》,国际联盟(成立于1920年)的章程和纲领。国联打着“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旗号,实际上不过是帝国主义列强奴役和镇压世界人民的工具。——译者

④ 普鲁士是德意志的一个邦,有军国主义传统。普鲁士手法,即全凭武力进行侵略扩张。——译者

常醒目的标题：日本首相被刺身死；严重的反叛；皇宫处在危险中。这是第四次重大的行刺。军部简直就象脱缰之马，正在横行无忌，显然是想建立法西斯制度。不过，尽管报上那么说，我不相信天皇会有危险，皇室恐怕是应当受到普遍尊敬的。其中一定有些情节搞错了。如果最近这次恐怖表示——杀害犬养首相，向几处公共建筑物扔炸弹——是一群狂徒干的，我不知道这种激烈行动会不会对军部本身发生持久的影响。到时候将会得到答案的。

沿途各大车站——芝加哥、奥马哈和旧金山，都有摄影师和记者迎接我们并请求接见，但对日本、日本问题或有关我出使的问题，我当然是一字不提；我略谈一点土耳其的情况，一般也就可以客气地把他们打发走了，这总比一句话不说好得多。檀香山的一家报纸把我们逗乐了，它说：

- 5 格鲁大使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兼备美国人的机警进取和欧洲人的谨慎矜持的性格。他个子高，常带迷人的微笑，说话慢条斯理，既不是波士顿式的，也不是英国式的，而是二者混合的悦耳的声音。

看来有点象个大杂烩了。

在奥马哈时有个记者问我，你认为最近三十年来展现的突出的世界外交问题是什么，我立即答道：“毫无疑问，建立一个国际和平机构。”他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危险因素是德国问题，以及一场俄日战争；对他的这种看法，我未作评论。

横渡太平洋

1932年5月20日。旧金山

请美国驻东京总领事加勒尔斯、驻天津总领事洛克哈特、他们的妻子、和格雷厄姆·小帕森斯吃便饭。小帕森斯是来当我的私

人秘书的，他是马萨诸塞州格罗顿镇人，耶鲁大学毕业，颇受我们格罗顿学校前校长皮博迪先生等人的赏识，又是美国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他很有前途，看来很热心学习，也热心助人。

乘大来轮船公司的“柯立芝总统号”于4时启航，加勒尔斯和洛克哈特以及日本总领事都来送行。纸片缤纷，欢声四起。送来鲜花之多、之美，为我生平所未见。

1932年5月20—6月6日。在“柯立芝总统号”上

航程相当顺利，起初风冷浪大，南下后逐渐转暖，风浪亦渐趋平静。自旧金山开船，开头四百英里航程显然一向都有这样的风浪。就头等舱来说，这条大船几乎是空的——头等舱旅客只有五六十人。23号那天，汽笛突然响了六下，船停了，放下一只小艇。原来是统舱里的一个中国妇女跳了海，丢下三个小孩。尽管我们的船在那周围转了大约一个多钟头，但再也没有见着她。

航行的头几天我就写了十五封信，拼命赶时间。还写了一些准备在日本用的演说稿，读了许多关于日本和满洲的资料。这次航行即使不能说令人兴奋，至少也是有用的。工作之外，有两项主要的娱乐活动：一是在露天游泳池里游泳——早餐前游一次，傍晚6在甲板网球场上狠打两三盘后又游一次，这样可以很好地保持健康；再就是隔一晚看一次有声电影。

1932年5月26日。檀香山

到檀香山的头一天简直象盛大节日。5时半起床，这使我想起从前进入秀丽的那不勒斯湾时，我的女儿安妮塔和我常常很早起来观赏风光。6点刚过，我们的船迎着岸上乐队奏起的夏威夷欢迎曲的乐声驶进码头。我家里其余的人也确实被乐声闹醒了。檀香山行政长官兼贾德总督的副官罗斯少校同领港员一起来到船

上,代表总督欢迎我们,给我们戴上这里惯用的花环。到傍晚,颈上套的花环一定有十多串了,我们不时取下旧的,换上新的——所有花环全是各种香花编成的。

那天白天,海军司令官耶茨·斯特林上将邀请我们去参观海军基地,并坐一回海军水上飞机,但我们太忙了,无法接受他的邀请。陆军司令官则派副官带花环来欢迎我们。日本总领事也来探望、送花。后来我用无线电报一一致谢。

从檀香山到横滨的十天风平浪静,和暖宜人,只有一两天的雨雾是例外。从旧金山经檀香山到横滨这整个航程,这条船本来是可以早三四天走完的,但因要与走这条航线的其他船只行动一致,所以不得不放慢速度。

到达东京

1932年6月6日。东京

啊,多么美好的日子!向往、期待了多少个星期、多少个月的日子、到来时不负所望者,是很少的,可是今天却远远超乎意想之外。为怕错过一件例行手续,我早上4点45分就起床了,自己也觉得好笑。大雾弥漫,只看得见其他船只朦胧的身影。昨晚我们的船只沿着日本海岸行驶,雾笛尖叫了一个多小时后,夜间某个时候便在横滨的锚场停泊了。到5点半钟,船上乱了起来:乘务员使劲打门,把每个房舱的门都捶得砰砰响,扯着嗓子大叫,要我们起来去见检疫员,五分钟后,又重演一次。那些乘务员当然懂得用怎样最彻底的办法来执行命令,但我还是怀疑,不用这种该遭人揍打的办法,难道就得不到同样的效果吗?

不管怎样,我们确实在上午6时便见到了检疫员。其实艾丽斯和我们的女儿埃尔西(她们只睡了两小时)大可不必穿戴得那么

早,因为日本方面已派有专人来照料我们,他根本没有见着我们就和帕森斯查完了我们的护照。另一个日方人员检查了我们的警犬基姆,另外发了一张健康证明书,同时还有第三个人照管我们的行李。一切都办得安静而有效率,尽量减少烦扰。

7点钟船靠码头以前,欢迎仪式就已经开始了。昨天已有一批欢迎电报传来。今晨,各类代表接二连三来到舱前。来客中有几个是日本新闻记者和摄影师,最后是大使馆的出色的参事埃德温·内维尔和他的夫人。我们排列好让人照像,又让记者提问;我当然绝口不谈政治,可是我对一些简单问题的回答后来也被精心篡改为访问谈话纪要。英文《日本时报》以“格鲁先生接见记者”为标题,开头就凭空造出这么一段话,说是我讲的:“我写过一本书叫做《远东的体育运动和旅行》,但对当前的日本我却几乎一无所知。我希望,一俟正式就任新职后,便开始认真学习。格鲁夫人的母亲就是海军准将佩里^①的女儿。……”等等,等等。好一个有来头的丈母娘!

我们终于和“柯立芝总统号”的阿林船长告别了,在蒙蒙细雨中驱车前往东京,但我却没有觉察到沿途的景色不佳,因为内维尔和我坐在一起,要谈的趣事太多了。到大使馆时,只见灌木成丛,草坪如茵,喷泉,鲜花,水池嵌以彩石,建筑物四幢,白色的房子装饰着黑色的铁制品,深陷在茂林之中——在这新兴城市的不大雅观的环境里,这里真是世外桃源。官邸在山脊上,俯瞰着办公处和宿舍,上下之间有茂叶密林中的石径可通。官邸内部,我们随内维尔夫妇查看了一遍,看了大客厅里的家具、窗帘和豪华的厚地毯,还有小客厅和更小的客厅,看了吸烟室及其精美的壁板、一排

① 马修·佩里(Mathew Perry, 1794—1858)是美国海军将领。1854年,他率领舰队到日本横滨,迫使当时的日本政府与美国签订一项开放日本港口的不平等条约。格鲁夫人的母亲并不是佩里的女儿。——译者